

福建佛教史

● 王荣国

● 厦门大学出版社

福建佛教史

王荣国

赠送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福建佛教史

王荣国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华安县升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华安县城关平湖路石狮境 2 号 邮编:363800)

*

开本 850×1168 1/32 15.625 印张 2 插页 386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1281-3/K·220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一

福建是一个喜欢烧香拜佛的地方。早在元代，那班撰修《宋史》的史官学士们，远在数千里外就已经把福建的这一景观写进《地理志》：“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至于那些土生土长于福建的儒生们，身处佛国，感受尤深，陈淳说：“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尤甚。”佛徒们不但喜欢烧香拜佛，而且还知道置产购田蓄财对于弘扬佛法的重要意义，故而明代的福建学者蔡清惊呼：“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古人写文章喜欢夸张，但从现在福建寺庙的星罗棋布与金碧辉煌的情景来推断，陈、蔡诸老先生的文章倒也不我欺，“纪实”也。

信佛的人一多，有关佛学的书自然也多。而热衷撰写佛书自然也是那些与佛比较有缘的人居多。以常理揣之，佛徒写佛书，想必更能体味佛学的奥妙，光大佛学的真谛。但从我等这些佛缘肤浅的人读了佛书之后，总是有些不明白。一个不明白是有些佛书着实玄奥，诸如“退法不退法死法守法住法必知法不坏法慧脱共脱……”，令人读起来如坠云雾之中。这种诘屈聱牙的佛书，大概连许多信佛的人也不甚了了，所以有一部分禅宗中人，索性鼓吹不立文字，不要佛书，来个一了百了，不了也了。可见佛徒读佛书，有时也是一头雾水。

另一个不明白处，是有些佛书把信佛说的神乎其神、佛乎其佛。前些日子有位朋友送我一本佛书，开卷第一页便有这样的文字：“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如果真有这样的神通，世界同化于男性，两仪难归太极，阴阳乾坤岂不大乱。宋代有一位忧国忧民的朱熹老夫子就对这种佛论

大为不满，他说世间所有人都信佛，“男大不婚，女长不嫁”，大家都执意不肯生孩子，长此以往，难免日臻空境，“不过百年，便无人种”，山青水秀的八闽大地，定然“变为禽兽之区”。这大概是至今仍有许多人不爱读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王君荣国在大学执教有年，他以一位学人的眼光来审视福建的佛教历史，自然可以克服以往佛书中那些故作玄奥与神乎其神的不明白处，从而为学界提供一部条理清晰的佛教历史著作，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王荣国君的。至于书中的宏议高论，高明的读者自会鉴识，何用我这“天机浅”的俗人来喋喋不休。

陈支平

1996年12月于厦大白城

序 二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通过黑白(夷夏)、敬否王者、神灭不灭等论争,大量译习佛典,由格义而会通,到唐宋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之一。一是佛教自身中国化,隋唐时建立起禅、华严等中国佛教宗派;二是佛学融合于儒道里,形成两宋理学。理学是以儒为主干融合佛道而形成的,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把中国文化推进至高峰。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两次大变革和繁荣,佛教都是主要角色,主要是在闽浙赣湘一带进行的。隋唐中国化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湖广,而后繁盛时“五家七宗”则转移至闽浙赣湘一带,“五家七宗”直接和间接的创始者三分之二为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制适合于中国佛教禅宗的“百丈清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主要活动于闽北,朱熹等的闽学是理学的核心部分。中国佛教南禅宗、宋明理学由南而全国,汪洋澎湃,以至东亚。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两次大变革和繁荣,反映出中国文化重心于两宋由北转移至南方。由上可见,研究福建佛教史对研究中国佛教史以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南方以至东亚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起点和突破口。

王荣国副教授著《福建佛教史》,长达30多万言,从汉直至近代,详细地论述了佛教在福建的发展。过去仅见《福建史稿》,《福建佛教史》此是首部,具有开创性。此书学术价值超出书名所标之地域。其显著特点,一是文献资料至为丰富。作者比较广泛地寻访福建有关佛教寺院、馆舍、碑刻、事迹、文献,发现许多前所未有的史

料；二是实事求是，论证精辟，有创见，发前人所未发；三是考证翔实，弥补许多有关文献的讹误和不足，例如，《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对禅宗南岳系芙蓉灵训生平的记载至略，作者通过对唐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三山志》等有关记载的考证，认定灵训即僧训，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开创闽城福州芙蓉山禅林。《五灯会元》目录“泐谭应乾禅师法嗣”列有“雪峰有需禅师”，而正文却无《有需传》。作者据《闽书·方域志》仙游县“南湖岩”条等记载，考证出有需为莆田人，于泐谭应乾处得法后返闽在仙游县何岩创万安院，后又应请任福州鼓山第十四代住持、雪峰寺第十九代住持。书中此类考论不胜枚举。

我相信，此书出版，对福建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高令印

1996年12月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前 言

十年前,我开设中国文化、福建文化课程时,开始接触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在开设福建文化课程时,积累了一些有关福建佛教史的资料。然因“佛法玄奥”未敢萌发写佛教史的念头。四年前,陈支平兄主编《福建宗教史》,邀我执笔其中的佛教篇,才被拉下“水”。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匆匆草就,使我时时烦恼缠身,眼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就是这种烦恼躁动的产物。

本书的写作力求追寻福建佛教自身发展的轨迹,比较系统地反映历史上福建佛教的基本面貌,注意探讨佛教各宗派在福建的传布,特别是在探讨禅宗在福建的传布时,适当变换写作角度,采取分派别、支系阐述其师资承传,同时尽可能地以佛教史籍记载与地方史籍相印证、补充,通过考证确定某位禅师在闽传法的确切地点、大致年代,并订正佛教史籍或地方史籍记载的疏忽。

福建自晚唐起就成了中国禅宗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作为《福建佛教史》无法一一包容,只能根据本书的写作意图作相应的取舍。拟在今后对福建禅宗的历史作进一步探讨,如“福建禅宗法系汇考”、“福建禅宗史”等。因此,本书在著名的禅师的禅学思想方面或略写、或不写,留待以后系统探讨。

作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汉东吴两晋南朝时期福建佛教	(1)
第一节 佛教传入福建与西晋寺院的出现	(1)
第二节 东晋南朝福建寺院的兴造	(12)
第三节 东晋南朝福建佛教界与拘那罗陀入闽	(32)
第二章 隋唐时期福建佛教	(37)
第一节 隋唐时期福建寺院的兴造	(37)
第二节 会昌法难、黄巢农民起义军入闽对福建佛教的影响	(53)
第三节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	(63)
第四节 禅宗在福建的发展	(77)
第五节 禅宗南岳系宗匠闽人怀海与青原系宗匠闽人义存	(119)
第六节 隋唐时期福建佛教与对外交流	(133)
第三章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	(141)
第一节 闽国统治者王审知父子与闽中佛教	(141)
第二节 吴越、南唐、留从效据闽与闽中佛教	(154)
第三节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宗派	(164)
第四节 《诸祖颂》与《祖堂集》的编撰	(202)
第四章 两宋时期福建佛教	(207)
第一节 两宋时期福建寺院兴造的极盛	(207)

第二节	两宋时期福建佛教宗派·····	(217)
第三节	佛教典籍的编纂与大藏经的刊刻·····	(282)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福建佛教·····	(293)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福建寺院·····	(293)
第二节	元明清时期福建佛教宗派·····	(300)
第三节	曹洞宗中兴宗匠永觉元贤·····	(316)
第四节	李贽开创居士佛教反对程朱理学之风气·····	(321)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福建佛教对外交流·····	(327)
第六章	近代福建佛教·····	(340)
第一节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与福建佛教·····	(340)
第二节	近代福建的僧伽教育·····	(357)
第三节	近代福建的居士佛教·····	(370)
第四节	佛教界领袖圆瑛与在闽南弘法的弘一·····	(375)
第五节	近代福建佛教向东南亚的传布·····	(395)
附录一	禅宗南岳系、青原系各派在闽承传谱系简图·····	(407)
附录二	福建佛教史大事记·····	(409)
附录三	福建现存的主要寺院·····	(431)
后记	·····	(486)

第一章 汉东吴两晋南朝时期福建佛教

第一节 佛教传入福建与西晋寺院的出现

一、佛教传入福建之探讨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古印度。到公元前三世纪，佛教被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定为国教，并且开始向外传播。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学术界存有歧义，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佛教大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曹魏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①这是中国人最早接受佛经、佛学思想的可信记载，表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东汉明帝时，佛教在中国得到传播。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异母之弟楚王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优婆塞”和“桑门”。“优婆塞”又译作“伊浦塞”，意思是“近善男”，指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桑门”又译作“沙门”，即和尚。说明楚王刘英礼佛而且供养和尚与居士。明帝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

①〔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影印《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以下凡引影印《二十五史》版本均同此。

浮屠之仁祠”，^①同时又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佛教为封建帝王所接受并加以提倡。不过，这时佛教只是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为中国人所接纳，而且主要限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中流传。

根据文献记载表明，到了东汉中后期，中原与江淮一带，佛教信仰已向民间传播。《后汉书·西域传》载：“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上行下效，民众信仰佛教的逐渐多起来。献帝时，笮融在江苏徐州建造“浮图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黄金涂像，衣以锦彩，堂阁周回可容 3000 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③可见东汉桓帝时民间开始有百姓信仰佛教，到献帝时民间信仰佛教的百姓多起来，而且出现浴佛会和施食活动。

那么，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佛教又是何时传入的呢？清代泉州人蔡永兼在其《西山杂志》中说，东汉永平十年，楚王刘英派大中大夫沙世坚入闽，为畚家人建三天竺庵即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于晋江一带。^④秦汉时期，福建境内建立的政治实体是闽越国，居民主要为闽越族人。后因闽越国谋反，为汉武帝所灭，迁其民于江淮，福建境内残余的闽越族人，有的后来为汉族所同化，有的演变为畚族等。东汉时，闽南一带无疑还有相当多的闽越族人。蔡永兼所说的“畚家人”应指“闽越人”。照蔡永兼的说法，佛教于东汉明帝

①〔刘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影印《二十五史》第 2 册。

②〔刘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

③〔西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四，《刘繇传》；又〔刘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三，《陶谦传》。

④〔清〕蔡永兼：《西山杂志》。转引自《福建文博》1992 年，第 1 期，第 72 页。

时就由陆路传入闽中。蔡永兼是泉州晋江东石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的祖上有人随郑成功抗清,遭到清政府的迫害。由于受牵连,蔡永兼未能走科举登第之路,而从事航海经商。终因海难船破,只得在家乡附近设私塾,授徒谋生。在此期间,他阅读了晋江富户吴氏家中的万卷藏书(其中可能有些书现在已佚)。在这一基础上,蔡永兼撰写成笔记体史书《西山杂志》。我们姑且不讨论《西山杂志》的上述记载是否真实,由于缺乏佐证,蔡永兼的“佛教于东汉由陆路传入福建说”无法确信。

考察东南沿海海上交通史表明,从汉代起至东吴以至南朝,东南沿海已成为通往广州、越南以及西域的海上通道,福建则是这条海上通道的要津。据《后汉书》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①《三国志·吴志》记载:“建衡元年(269年)春正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珣、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勰、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②这里的“东冶”、“建安”均属今福建之地。可见东汉、三国时期朝贡征战取海道的均经福建。当时西域滨海地区的佛教僧人很可能取海路来华。虽然史书缺乏东汉至东吴时期西域僧人取海路来华的记载。但据《高僧传》载,刘宋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以元嘉元年(424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即求那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汎舶延致”。^③梁朝时,菩提达摩也是取海路来中国的。“时达摩和尚泛海东来,经于三载,梁普通八年丁未之岁(527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广州上舶,刺史萧昂迎,奏闻梁帝。

①〔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三,《郑弘传》。

②〔西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三,《孙皓传》。

③〔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三,《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亲驾车辇迎请大师升殿供养。”^① 据此可以推测，东汉、东吴、西晋时期，很可能有西域僧人取海路来华。近年来，有人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陶制的胡俑、堆塑器物、塔式罐等进行研究，认为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开始，西域滨海地区的“胡人”以奴隶、商人、艺人、佛教徒等身份，从海上入居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而把佛教带进中国，其明显的表现是当时这一带民俗观念的巨大变化。今天所能见到的考古出土的狮、象、鸽子等象征性动物形象，堆塑器、塔式罐之类的象征性建筑造型以及托钵僧俑、胡人俑和佛像等是佛教文化从战国以后至东汉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流行的艺术积淀。提出“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②

前已述及，福建至迟从东汉起就成了东南沿海海上交通的中转之地，根据“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笔者认为，很有可能在东汉至东吴这一时期，经海路来华的西域僧人来福建活动并将佛教传入福建民间。不过，这一时期经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佛教并没有获得发展。此后，福建与东南沿海其他省份一样，其佛教是从中原向南传播发展起来的。

二、西晋闽中佛教寺院的出现

东汉末年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崩溃，儒学一尊的地位也随之瓦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局面。在玄学流行的同时，中原佛教也获得发展的条件。西晋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最重要的莫过于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从而为佛教的发展提供僧源保障。佛教借助西晋王朝的行政力量向各地传播，佛教寺院也随之出现以至增多。当

①〔南唐〕静、筠：《祖堂集》卷第二，《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4年版。

②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时东、西两京(即长安与洛阳两地)共有寺院180所。福建在西晋太康年间也开始兴造佛教寺院。福建西晋有纪年可考的寺院有如下几所:

药山院 《八闽通志》载,侯官县“药山寺,晋太康元年(280年)建。……在十四都”。^①而《三山志》载,侯官县“药山院,齐礼里,太建元年置”。^②考《八闽通志》可知,侯官县“十四都,……距府城六十里。宋齐礼里。”^③显然,《三山志》所载的“药山院”即《八闽通志》所载的“药山寺”。《八闽通志》又载,侯官县“药山,……在十四都”。^④说明该寺院建于药山,以山为名。上述二志所载的分歧在于:“寺”与“院”之别以及建造年代的不同。笔者认为,该寺院原名应为“药山院”,很可能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三山志》成书之后,由院升为寺,其建造年代很可能也是在《三山志》成书后,经后人考证确定为晋太康元年而为《八闽通志》所采纳,当然也有可能是黄仲昭在修《八闽通志》时考证出的。现寺院名称从《三山志》定为“药山院”,建造年代从《八闽通志》定为“晋太康元年”。

灵塔寺 《八闽通志》载,侯官县“灵塔寺,在十一都。晋太康三年(282年)建。唐武德二年(619年)赐额。”^⑤而《三山志》载,侯官县“灵塔台,永宁里,旧记灵塔寺,晋太康三年置,武德二年赐额”。^⑥考《八闽通志》可知,侯官县“十一都,……在府城西南三十

①⑤〔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五,《寺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册。此册自卷之四十四至卷之八十七。

②⑥〔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四,《寺观类二·僧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4册。

③〔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十五,《地理·乡都》。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此册自卷之一至卷四十三。

④〔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四,《地理·山川》。

五里,宋旗亭、志节、倬和、永宁、兴和、加川、畴川七里。”^①可见,明代侯官县的十一都包括宋代的永宁里等7个里。显然,《三山志》所载的“灵塔台(原称灵塔寺)”即《八闽通志》所载的“灵塔寺”。二者建造年代一致,寺院名称亦基本一致。唯一的疑点在于,《三山志》何以将“灵塔寺”记作“灵塔台”呢?《八闽通志》载,灵塔寺久废。^②《三山志》“灵塔台”条亦仅载至唐武德二年,唐以后均不载。说明灵塔寺到宋代已是塔寺俱毁,“灵塔”仅存台基,故称“灵塔台”。以上二志均载,灵塔寺为唐武德二年赐额。晋代初创时的寺名是否亦作“灵台寺”已无从考证。现寺名仍作“灵塔寺”,建造年代为晋太康三年。

绍因寺 《八闽通志》载,怀安县“乾元寺,在府城北隅越山之南麓。晋太康三年(282年)建。初名‘绍因’。唐乾元三年(760年)赐额。”^③而《三山志》载:“怀安乾元寺,州北无诸旧城处也。晋太康三年既筑新城,遂以为绍因寺。唐乾元三年,防御使董玠奏赐今名。”^④所谓“无诸旧城处”即位于今福州市越山(亦即越王山)南麓,为闽越王无诸故城所在之处。显然,二志所载一致。“乾元寺”之名是唐乾元三年所赐,以年号命名的。原寺名为“绍因寺”,建造年代为晋太康三年。

建造寺 万历《泉州府志》载,南安县“延福寺,在九日山下,晋太康时建(280—289),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768年)移建今所。宋乾德中(963—967年),陈洪进增建,乃改名曰:‘延福’。”^⑤《闽书》南安县“九日山”条载:“山麓有寺,曰‘延福’,其始晋太康中所创,去山二里许,其移山麓,则唐大历三年。寺额欧阳四门所书

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十五,《地理·乡都》。

②③〔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五,《寺观》。

④〔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类一·僧寺》。

⑤〔明〕阳思谦、黄凤翔:《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寺观宫庙类》。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影印,1985年版。

也。大中五年(851年),赐名‘建造寺’。……寺,故五十有四,宋元丰间(1078—1085年),合为延福禅寺。”^①清修《南安县志》“延福寺”条只是照录万历《泉州府志》所载。^②而清修《泉州府志》则载:“延福寺,在县西九日山下,……晋太康间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移建今所。寺额欧阳詹所书,进士傅荀读书其中。大中五年赐名‘建造寺’。宋乾德间,陈洪进增建,复旧名。支院故有五十余区,元丰间合为大禅寺。”^③与《闽书》所载基本一致。上述四部志所载互有异同:

其一,关于寺名。《闽书》、清《泉州府志》认为,原名“延福寺”,唐更名“建造寺”,宋名“延福禅寺”;而万历《泉州府志》、清《南安县志》则认为,“延福寺”之名为宋乾德中陈洪进增建后改名的。那么,延福寺是何时命名,是否原名?考北宋端拱年间(988—989年)曾会《重修清源郡武荣州九日山寺碑》(以下简称《碑文》)载:“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罗那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汎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④《八闽通志》“九日山”条载:“翻经石。梁普通中,僧拘那罗陀尝翻译《金刚经》于其上。”^⑤《碑铭》所载的“拘罗那陀”即《八闽通志》所载的“拘那罗陀”,^⑥曾于梁朝来中国,途经九日山并翻译了《金刚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之八,《方域志》。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册。此册自卷之一至卷之四十。

②〔清〕刘佑:《南安县志》卷二十,《杂志之四·寺》。台北市南安同乡会印行。

③〔清〕怀荫布、黄任:《泉州府志》卷之十六,《坛庙寺观》。泉山书社民国十六年乾隆版补刻本,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影印。

④〔清〕怀荫布、黄任:《泉州府志》卷之十六,《坛庙寺观》南安县“延福寺”条。曾会所撰碑文全称依清陈仕国所辑《丰州集稿》卷十。下同。

⑤〔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地理·山川》。

⑥参见本章第三节。